

杨联陞 著

国史探微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杨联陞 著

国史探微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史探微/杨联陞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5. 5

ISBN 7-80148-753-2

I. 国… II. 杨… III. 中国—历史—文集

IV.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1856 号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址: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9 号华普花园

邮政编码:100007

电话:010-84094409

传真:010-84094789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960×1300 1/32

印张:8.625 字数:214 千

版次:2005 年 5 月第一版 200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2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台湾版序

岁暮天涯，时觉岑寂。忽然接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寄来的《国史探微》全书分页校样，知道此书不久可以问世，为之一喜。

此书共收我的论著十四篇，原作都是英文（只有第二篇附录“朝代间的比赛”是中文原作）。联经公司分请六位学人（大名见后）给译成中文，又请人校阅过，今年7月下旬，我来台开会（“院士”会议）得以抽暇看过全部译稿，很欣赏译笔之忠实畅达。我除了对各位译者深致谢忱之外，只建议了很少数的小修改，并且增加了若干条按语补注。现在重新校阅，发现全书只有二十几处需要改动。足证联经各位先生编辑校印之认真，可敬可感。在附录又看见为我特别编制的中外文著作目录，已经十得其九。多费清神，统此致谢！

联经公司选定这十四篇论著时，曾同我的挚友余英时教授（耶鲁大学史学讲座）商量。书名《国史探微》大约也是与余教授商定的，意兼嘉勉。我喜其简洁，欣然同意，中国人治中国史，自然是“国史”。“探微”可释为力求深入，探索精微，是撰文的目标主旨。能达到几成则不敢说。友人厚意勸勉，自应致谢。

十四篇的排列，大抵依照论文的性质，以类相从为序。第一篇中国的世界秩序（邢义田译），第二篇朝代兴衰刍论（陈国栋译）包罗较广。第三篇作息考（梁庚尧译），第四篇女主考（林维红译），第五篇人质考（张荣芳译），第六篇明代地方政府（张永堂译），这四篇是社会

史政制史。再下六篇(即第七至第十二篇)是经济史(陈国栋译,连前共译七篇)。末后第十三、十四篇是史学史(张荣芳译,连前共译三篇)。各位译者下笔都很细心。对各篇引用的文字,尤其是要转回中文时,费时查对,不厌其烦,对读者大有补益,我深为感激。

关于这十几篇写作之因缘,问世之先后,想补充几句说明。第一篇中国的世界秩序,是为了费正清教授(J. K. Fairbank)主持的一个专题讨论会写的。会在1965年9月,论文集由费教授主编,于1968年印布。卷首有一扉页说是全体撰写人献此书与哈佛燕京中国史讲座教授杨联陞。我受宠若惊。回想在会中可能说话太多,有时近于讲演。但如“蕃番藩”三字用法之同异似不能不论。第六篇明代地方政府,是为了参加贺凯(C. D. Hucker)教授主持的明代政制讨论会,时在1965年8月,论文集则在1969年印行。这一类的讨论会,前后参加过六次。每会都有十几篇论文,共同讲评,颇费心力。这一年8月9月连续开会,当时情绪亢奋,健康可能已受影响。近十几年有邀请的唐史会、法律史会、道教史会,都辞谢了。

第三篇以下,除了第六篇与第十四篇之外,都曾在哈佛亚洲学报(简称HJAS)发表。后来分别收入我的两部论文集《中国制度史研究》(1961)与《汉学散策》(1969)。论著目录没有分列各书所收单篇文字。制度史研究共九篇,皆见于HJAS,《汉学散策》共十四篇,分见于HJAS及通报等处。

本书第十一篇发表最早。“晋代经济史释论”是我的博士论文《晋书食货志译注》的引言。论文是魏楷(J. R. Ware)教授指导的。1945年冬交入,1946年2月成博士。因魏教授是HJAS主编,1946年即已印出。他认为我的论文虽坚实而有时太拘谨,很少断语推论。此题确尚有不少可以发挥之处。但我当时还是学徒,岂敢放言高论。次早问世的是第十三篇“二十四史名称试解”,曾在美国东方学会(AOS)宣读大旨,在1947年HJAS发表。朝代兴衰、作息考等文也曾各学会的年会用近十五分钟乃至半小时发表节略。记得陈荣捷教授在会后曾劝我多批评西人滥用的朝代

循环论,所以后有“朝代间的比赛”补充,尚有余蕴。

第十四篇唐至明代官修史学是1956年在伦敦大学举行的亚洲史学史讨论会特邀撰写的。此会规模不小,中国史有英法德荷各国的汉学家撰文。美国只请了拉提摩(Owen Lattimore)与我,而我又是唯一的华人撰文者,在会中不免说话稍多。有一次会后,伦大的老西门教授(W. Simon)笑用中国话对我说:“你是盟主。”我说:“那可不敢当。”大会也请了法国汉学泰斗戴密微教授(Paul Demiéville),戴老不能来,只补写了论章学诚一文,很多精彩。若戴老来做盟主,可以当之无愧。大会中国史日本史部分的论文,合为一册,题为《中国与日本的史学家》(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由毕斯雷(W. G. Beasley)与浦立本(E. G. Pulleyblank)两教授合编,1961年出版。但在此之前,有些文章已用德文译出,我那一篇见 *Saeculum* VIII, Heft 213 (196—209)。

第九篇公共工程(兴建考)是1962年3月在巴黎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用法文作的演讲。这是戴密微教授给我安排的殊荣。学院规定必须用法文(巴黎大学可用英文),每周一讲,共讲了四次(那一个月作为客座教授),听众不少,行家很多。我的法文不够,写了英文稿,请侯思孟(Donald Halzman)博士译成法文,戴老亲自改定。读音请吴其昱博士指点,时时练习,幸未辱命。四讲之后,有当地东方学者数十位自费合请在美术馆设宴作贺,盛意可感。又以戴老的安排,把四讲印成一本小书 *Les aspects éconmiques des travaux publics dans la Chine impériale, quatre conférence*(法兰西学院,1964)。英文稿则直到1969年因戴老给我的《汉学散策》作序时提起才决定收入。今日中文稿得以问世,而戴老早归道山,请益无从。硕学盛德,令人追怀不已。

杨联陞

美国麻州阿令屯

1982年12月28日

撰写此文,部分原因是为了申请密歇根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1964 年

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及成员:

主 席:费维恺教授

成 员:赵 纲副教授

雅各布·M. 普里斯副教授

余英时副教授

目 录

台湾版序	1
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	1
国史诸朝兴衰刍论	14
附录：朝代间的比赛	30
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	43
国史上的女主	63
国史上的人质	76
明代地方行政	89
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	110
侈靡论	
——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	119
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	134
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	188
晋代经济史释论	205
会子形状考	232
二十四史名称试解	239
官修史学的结构	
——唐朝至明朝间正史撰修的原则与方法	245
附录 杨联陞先生论著目录	262

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

中国中心之世界秩序：神话与事实

有人常以中国之世界秩序为一以中国为中心的层级。理论上，此秩序最少有三方面是层级的：中国是内的、大的、高的；而蛮夷是外的、小的和低的。然而，对整个中国历史加以观察，即可发现这个多面的中国中心之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时间，从许多程度不一，甚至有时几近于零的事实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神话。

在东亚，中国以军民合一的力量无疑经常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但是不可就此推论，中国毫无其他文明国度存在的观念。汉朝史籍对文明的西方民族——大秦（大秦，字义上即伟大的中国），即极为赞扬。中世纪时，许多中国人崇拜印度，因为那是佛教的老家。又有许多时期，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对待邻近的民族如平等之敌国，譬如汉与匈奴，唐与突厥以及后来的吐蕃，宋与辽、金、元之间的关系都是如此。他们彼此还常常用一些亲属的称呼，如宋帝与辽帝即以兄弟相称。不过，1138年，南宋高宗与金人媾和，却被迫接受臣的地位。后来他的继承人（译按：宋孝宗）把地位改善为侄，称金帝为叔，叔即父亲之弟。汉朝、唐朝为了维持边境的和平，常把公主或皇族的女子嫁给蛮族的领袖。每年还要送大量值钱的礼物给北方的邻族，名义上是经济援助，事实上从另一面看，

就是朝贡。“外国”一词,并不始于19世纪而可以追溯到汉代。宋朝,“外国传”已成为史书中的一项。因此认为在1800年以前,中国没有国际交往的经验是不正确的。

无疑,中国在周朝后期曾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国的观念。近代某些学者曾将春秋时代(前722—前481年)的列国和近代的国际关系相比拟。战国后期(前403—前221年),列强独立,不再尊周王。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其实就在为一个国家下定义。周代末期(至前221年)“天下”和“中国”之间有了区别,后者把边远的国家如秦、楚、吴、越排除在外。

中国的内服、外服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观念。传统上我们把这种观念推到渺茫的远古。夏、商时,据说有五服之分,而周有九服。九服或九极之最外者叫蕃服或蕃极。蕃字是草字头,蕃字另一个写法是草头水旁的“藩”字,意思是“屏藩,藩臣”。后来,草字头的蕃,也用作藩字的意思,指“外国的、蛮夷的”〔1〕。

虽然这些周密的区分大部分是凭空虚构,但是似乎也反映了商、周时一个较合乎事实的内服——王畿,和外服——诸藩的划分〔2〕。当然“内”、“外”只是比较而言,因此我们可以说内还可以有内,外还可以有外,一直分下去。由于军事、文化扩张的结果,一些外服可以被并入内服,所有诸藩都有变成外藩的可能,或者更通俗地说,所有生蕃都可能变成熟蕃。

然而,内外相对的用法,并不意味中国和邻邦或藩属之间没有疆界。史书中有许多争论和解决疆界问题的例子。有一次汉帝

〔1〕《尚书注疏》(《四部备要》本)卷5,页6下;卷6,页7下—19;《周礼正义》(《四部备要》本)卷55,页7—10;卷71,页15下—19下;《国语》(《四部备要》本)卷1,页3。又参见 John K.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Harvard Univ. Press, 1968.), 页9。

〔2〕《尚书注疏》卷14,页1下,页11;卷15,页2下;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1956),页319—332;安部健夫,《中國人の天下観念》(1956),页14—37。

(译按：汉元帝)曾提醒匈奴单于，边塞不仅是为了防外患，也为了防止中国罪犯逃逾边界。当然，边界不必常是一条线，它可以是一块双方都不准占领和垦殖的地带，也可以是一块其居民同属两国的地带，或一个缓冲国。中国皇帝也可能片面地宣布一个疆界，例如：据说宋太祖曾以玉斧在地图上沿云南大渡河划一条线，宣称：“自此以外，朕不取”。王赓武教授也指出明太祖曾将十五个或更多的国家，包括朝鲜、日本、安南和爪哇等视为“不臣之国”，中国对他们将不加征讨〔1〕。此外，还有一点须记住，文化的和政治的疆界无须一致。

讨论中国的世界秩序，尽可能分清神话与事实，当属重要，两者都可彼此影响。一个人可以说神话是一个文化的或心理的事实，但是无论如何要和政治事实分别清楚。

郭嵩焘：《绥边征实》

李雅各(James Legge)在1872年出版的《春秋左传》英译本序言中，曾严厉批评中国的官吏和人民不能够“了解中国仅是世界许多独立邦国之一的事实”(页52)。所幸也有少数例外，郭嵩焘(1818—1891年)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约于19世纪中叶，郭嵩焘已经意识到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局势里。在儒家传统中成长的他，很快就回到历史中，去寻找有用的教训。他将秦、汉以至明代的外交作了一次历史的观察，著成《绥边征实》。其目的在纠正南宋以来学者虚文无实之弊。以下是摘自该书仅存的序文部分：

善夫班氏之论曰：圣王制御蛮夷，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贡献则接之以礼，羁縻不绝而常使曲在彼。自唐刘昫述武指驳班氏之失，以谓详而未尽，后

〔1〕《明会典》(万有文库本)卷105，页2281。

世儒者，袭用其说，务为夸诞，而后汉、唐控御夷狄之大略绝于天下者七百余年。新莽（8—23年）时，严尤论御匈奴无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刘琨反之，以为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汉得下策。周世狃犹（一般认为是匈奴之祖）未至强盛，畎戎之难，平王东迁，遂丧成周，安得有策哉？持论者徒曰间隔华夷，无穷兵而已。然不欲穷之于秦、汉强盛之时，而乃欲穷之于靖康、绍兴积弱之日，此又何说也？班氏之言曰搢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董仲舒大儒，魏相名臣，皆搢绅之儒也。南宋之初，言战者一出于搢绅，而韩世忠、岳飞之流，犹断断然能以战自效。继是而文吏高谈战略，武夫将帅屏息待命，神沮气丧，功实乖矣。

是以宋明之世，议论多可观者，而要务力反班氏之言，常使曲在我〔1〕。

郭书据说共二十四卷〔2〕。假如此书仍存，且能印出来，无疑是一本有趣的书。现在我们可以进入本文的主要议题了：古典儒家应付非我族类的传统，帝国时期对绥边的见解，尤其是羁縻政策〔3〕。

〔1〕《养知书屋文集》卷3，页15下—17下。

〔2〕据王先谦撰郭嵩焘之神道碑铭，见郭嵩焘著《玉池老人自叙》卷首。

〔3〕关于郭嵩焘，参见：A. 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943), I, 438-439 (by Tu Lien-che); S. Y. Teng and J.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1954), pp. 99-102; 和 David Hamilton, "Kuo Sung-tao: A Maverick Confucian," in *Papers on China*, 15: 1-29 (1961)。这三本书都没有提到郭嵩焘写的《绥边征实》。

Hamilton书第18页，将“国体”一词视为与儒教秩序（Confucian Order）同义，此说并不误，但为一哲学上的误解。严格而言，国体一词仅指国家基于体制之尊严（体统或体面）。同样地，政体仅指政府的尊严。最少郭嵩焘时代通常是这样用法。国体、政体用来指政治结构或制度，要迟至清末君主立宪或民主立宪问题发生后始出现。

古典儒家应付非我族类的传统

孔子的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上千年的文化,也累积了可观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经验。这个背景最少能部分地说明春秋时期的人,对战争和蛮夷所持的相当成熟的见解。在儒家经典《左传》中〔1〕,我们可以分出两种趋向,一是以绥靖,一是以战争为对付蛮夷最有效的办法。由下面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多数的意见都混杂有分量不同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诱服和威迫。由于这些典故大部分都是我们所熟知的,它们说明了可以被用来征引的典故之间的差异性。

A 绥靖论

(一)“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左传》,页149,管仲曰)

(二)“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页320,楚子曰)

(三)“戎,禽兽也。”(此句李雅各未译)

“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怀威,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迓安,五也。”(《左传》,页424,魏绛曰)

(四)“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菑也,将或弭之,虽

〔1〕 本文所有经书皆采李雅各之译文,但改用 Wade-Giles system 之罗马拼音法。以下引文见李雅各译《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卷5:《春秋左传》(London: Henry Erowde, 1872; reprinted Hong Kong Univ. Press, 1961);卷1:《论语》、《大学》、《中庸》;卷2:《孟子》,修正第二版(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3 and 1895; reprinted Hong Kong Univ. Press, 1961.)。

曰不可，必将许之。”（《左传》，页 532，韩宣子曰）

（五）“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左传》，页 814，子服景伯曰）

B 主战论

（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左传》，页 124，管仲曰）

（二）“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左传》，页 317，随武子曰）

（三）“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左传》，页 424，晋侯曰）

（四）“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左传》，页 534，子罕曰）

（五）“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页 777，孔丘曰）

正像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主战论和绥靖论并不一定相冲突，而能相辅相成，成为同一政策之两部分。A——（一）、B——（一）都是齐国名相管仲的话；B——（五）是孔子的话，孔子在《论语》里还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页 282）

当孔子编纂《春秋》时，他已经有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看法，这是一个传统。另一方面，另一个《春秋》的传统却强调“王者无外”〔1〕的原则，换言之，理想的国君应是一实实在在的天下之王而无内外之分。王赓武教授的论文显示了这个观念在明代时的功用。

在别处，孔子显得较和平，较富理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中庸》，页 409）从这个句子里，人们挑出了两个关键字眼，组成“怀柔”一词。他又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夷之邦，行之矣。”（《论语》，页 295）“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

〔1〕《春秋公羊传》（《四部备要》本）卷 1，页 1 下—2，7—8；卷 5，页 3 下；卷 12，页 3；卷 18，页 1 下，5 下。陈柱，《公羊家哲学》（1929），“尊王说”，页 1 下—2 下。

来之，则安之。”(同上，页 308—309)

这些强调不以威迫赢得外夷的看法，显然和一个可能较古老的意见：“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页 196)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孔子也认为戒备是需要的，他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页 275)

同样地，当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和“善战者服上刑”(《孟子》，页 305)时，他却赞美商汤、周武。因为商汤“惩其王，绥其民”(页 273)，周武王“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页 274)。他又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页 253)

总而言之，虽然古典的儒家传统倾向于绥靖和理想，但它绝非偏执一端。这种态度有时显得很矛盾。但是，如果假设威迫和诱服为同源的原则的话，也许也是合理的。

孟子还曾留下一段处理外交的名言：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孟子》，页 154—155)

朝鲜的历史里，有一段漫长的时期，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是“事大”，它和日本的关系可谓“交邻”。“事大”、“交邻”二词都出自孟子的这段话。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在远古的时候，就喜欢将外族和各种动物相比。正如以上引文中所见，外族的名称，常加上表示动物的偏旁。例如：北方外族——“狄”，有个犬字边；南方外族——“蛮”，有一虫字。在古代的天下观里，认为荒远之区乃蛮夷、猛兽、魍魉所居。《左传》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页 355)，乃一古老之通论。当然，许多外族在身体的特征上和中国人不同；再者，多数中国人相信外蛮较贪残、好战，因此，在性格上与野兽更相近。这种古老的联想一直传下来，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里看到的。还

有一点须说,种族歧视并非某一文化或某一社会才有的习惯。假如这个习惯形成于一个人的孩童时期或一个社会的早期,则难以革除。可是,我们现在辛苦地把它指出来,也许会使它从此消除。

帝国时期几种绥边的见解

汉代董仲舒和魏相都反对穷兵黷武,魏相的看法是紧紧源自儒家的传统,他分用兵为五类:

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1〕。

董仲舒认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如此可减三军之费,边界赖以安〔2〕。不过,班固认为董仲舒的政策不合于时,尤其是他建议减边备的主张。

郭嵩焘在前引书的序言里,并没有提到汉初另一位思想家——贾谊。他以“三表五饵”策著名。从贾谊的《新书》看,三表是指汉帝“信”其善言,且“好”胡之长技,使匈奴觉得能见“爱”于天子。五饵是:匈奴之降者,衣以文绣,乘以车乘;享以美食;愉以歌舞、戏乐、妇人;居以高堂邃宇,善厨处,大困京,库有阵车、奴婢;并多赐各式美物。如此,以坏其目、坏其口、坏其耳、坏其腹,而后获其心〔3〕。

〔1〕《汉书》(涵芬楼本)卷74,页2。

〔2〕同上,卷94下,页12—13下。

〔3〕贾谊,《新书》(《四部备要》本)卷4,页2—5。

《汉书·贾谊传》赞里〔1〕,班固曾提到贾谊的三表五饵,没有详细的说明,只说其术固以疏矣。不过班固没有料到,及乎宋代,长期的和平得以保障,显然就是因为辽和后来的金,每年从宋得到岁币银绢,柔弱下去的结果。虽然宋人觉得可耻,可是连程颐、朱熹也承认贾谊之策,于宋得大行其道〔2〕。然而其中显然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双方和平未能达成之前,军事行动却陷于僵局。

过去学者很少注意到一点:贾谊也曾建议过一个积极的政策,将降胡分置于边塞之外,每千家为一国,各有分地,使依中国之制,建立一边境的封建体系。安置降胡一直是帝国时期的一个严重问题,尤其当这些解决的方法,还包含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的问题在内的时候。

严尤赞扬周宣王有限度的征讨,命将征之,尽境而还。依严尤所论,外蛮犹如蚊虻,唯一有效的方法即挥之而去。武帝深入匈奴之境,靡耗过甚,因此被列为下策,而更下者莫过于秦始皇竭民力以修长城〔3〕。

正如郭嵩焘指出,刘勰证明长城是一颇具效用的设计,虽费一时而贻长久之利,所以他说秦得中策,仅次于周。但是刘勰认为汉为了维持和亲,以公主礼物送给单于是可耻和耗费的。他说汉不当在匈奴盛时击之,弱时贿之,钱应用在边防上。他反对质子制度,反对中国与外族之间使臣和经济上的交往。如此,外族会变得更诈,更贪,更难驾御,而且中国也会因外来的奇技淫巧而败坏。简言之,蛮夷禽兽,无须虚礼以待,更无须与之争辩〔4〕。总括而言,刘勰的立场似乎是一味的孤立主义。也许这是对唐代过分的天下一家主义的反动。无论如何,郭嵩焘的评论似乎最中肯。

南宋以来的儒生,和武人更换了立场,一变而为主战。这是郭

〔1〕《汉书》卷48,页13。

〔2〕《朱子语类》卷135,页17下。

〔3〕《汉书》卷94上,页10。

〔4〕《通典》(图书集成本)卷200,页5—6下。